

# “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研究<sup>\*</sup>

杨东亮 王晓璐

摘要：“90后”流动青年以其特有的代际特征吸引了广大学者的研究热情。本文使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总结“90后”流动青年的群体特征，研究各因素对“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性别、民族、户口、婚姻、教育程度、流动范围、流入区域对“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差异化影响。拥有较高的城市生活保障能力、较高社会资本的职业就业身份，能够显著地提高“90后”流动青年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在此基础上，以促进“90后”流动青年融入城市为目的，提出全面提高青年人口教育程度，鼓励以家乡为原点进行近距离流动，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务配套改革等启发性政策建议。

关键词：90后 流动人口 城市融入 居留意愿

##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和人口流动限制的进一步松动，区域经济差距和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大规模的持续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户籍登记地与现居住地不一致，且离开户籍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达到2.21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7%（崔岩，2012）。在我国人口流动大潮中，农村向城市、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占绝大多数，以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世界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奈特（Knight，2011）将农民工与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制造工厂”相关联，并认为人口流动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来源。

与此同时，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民市民化滞后于土地非农化的“双滞”问题（李培林、田丰，2012）。除了市民化高昂的经济成本的制约外，农民融入城市的意愿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基本上都在1980年以前出生，他们大多数与农村有着难以割裂的成长记忆和深厚感情，具有强烈的返乡意愿。进入新世纪，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程度、价值取向、生活经历、家庭经济条件、社会认同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别（王春光，2001；刘传江、程建林，2008）。邵岑和张翼（2012）的研究发现，“80前”与“80后”流动人口在受教育程度、职业身份等方面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并对家庭迁移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当前，“90后”群体已经进入青年阶段，与“80后”一起构成了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文简称“卫计委”）2015年开展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发现“80后”占比最大，达到36.6%；“90后”占比18.7%。与“80后”生活的社会宏观背景和家庭微观环境不同，“90后”群体中充斥着“官二代”、“富二代”、“农民工二代”、“贫二代”等特

<sup>\*</sup>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区域经济发展的‘集聚式收敛’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的阶段性成果（14YJC790150）。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给予的宝贵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殊人群 流行着“杀马特”<sup>①</sup>、“小清新”<sup>②</sup>等具有鲜明特征的品味文化。互联网的出现,加剧了“90后”整个代际群体的社会化进程,并对“90后”群体的内部分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据调查,“90后”普遍拥有数字化生存自觉,更多地依赖手机、电脑,被标记为“互联网的一代”、“娱乐化的一代”和“自我的一代”(施芸卿、罗滌 2014)。在未来的10年里,今天的“90后”将逐渐取代“80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其社会化过程的早期,即在性格、思维、习惯等个体塑造的青年阶段,前瞻性地研究“90后”流动青年的群体特征、融入城市意愿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 二、文献综述

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是人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自由流动下的人口迁移,是根据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经济社会生活条件判断的结果,迁入地的优势和迁出地的劣势,构成了人口迁移的拉力和推力(Lee, 1966)。李强(2003)全面分析了影响中国城乡人口流动的推力与拉力因素。推拉理论中衡量生活是否改善的一个重要量化指标就是工资收入。王凯和周密(2015)发现日本首都圈内的人口迁移与工资收入密切相关。个体会根据劳动报酬的高低理性地选择迁移行为,并将迁移的机会成本纳入到预期收入变化中进行考虑(Ritchey, 1976)。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持续扩大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因(Johnson 2003; Fan 2005)。在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是流动迁移的主体。著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指出,由于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是无限供给的,付给这些流动人口的工资仅需达到维持其基本生活需求的最低水平即可(Lewis, 1954)。因此,出现在城市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未必完全是因为工资收入的增加或满足预期而流动。劳动力迁移不仅与城乡收入的绝对差距有关,还取决于流动人口在家乡感受到的相对贫困度,与其经济社会地位的相对变化有关(Stark & Taylor, 1991)。在中国,无论哪种迁移动机占主导地位,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必然的,这一过程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持续流动(蔡昉, 2001)。

与强调经济因素影响个体的流动决策不同,社会学视角下的人口流动行为受其生命周期所处阶段、家庭亲属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制约。第一,作为流动主体的人,其生命历程是嵌入于社会整体变迁和结构性变化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发展力量的冲击与社会事件对个体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在不同社会时空条件下成长的个体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不同的群体属性特征。对于流动群体来说,生命历程差异、社会设置滞后与文化堕距的共同作用,形成一定的代际差异特征。与阶级、阶层、种族等社会分析概念相同,“代”也是人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人群划分方法(周怡, 1994)。以10年作为一代人,田丰(2009)对我国“70后”和“80后”的公平感和民主意识进行了研究。第二,家庭的周期结构特征是影响人口流动迁移的重要因素(邵岑、张翼, 2012)。基于投资组合和契约理论思想,个体迁移被看作是家庭抵御风险、稳定收入的重要手段,是一种家庭决策行为(Stark, 1991)。第三,个体流动行为受其社会资本的影响。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资本(李培林, 1996),还是支持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存发展的重要力量,体现在其对流动人口就业、工作稳定、城市适应、融入城市社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上(方黎明、谢远涛, 2013)。

在流入城市的基础上,融入城市更加重要。鼓励支持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已经成为国内学界的共识,其拉动消费、稳定劳动供给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而易见。虽然户籍制度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融入的进程(朱宇、林李月, 2011),但是户籍并非根本原因,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要远比吸引人口进城务工困难得多。以我国人口的流动经验来看,融入城

① “杀马特”是指生活在农村或城乡结合部一群特别的“90后”的代称。多为中学或中高职技校毕业,与多人合租在价格较低的民房或地下室,从事理发店员工、保安、餐馆服务员、血汗工人等工作,少数人甚至从事灰色与黑色地带工作,虽然经济能力孱弱,但比城市青年具有更酷更拽的奇异造型。

② “小清新”是指偏爱清新唯美的文艺作品,生活方式深受清新风格影响的青年群体。普遍接受了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秉承淡雅自然朴实、超脱静谧的特点,大多属于城市中产阶级,一定程度上代表主流城市青年文化。

市的完成需要经历初次流入、往返变换、停留定居三个阶段。对青年流动人口来说,作出流动决策的第一阶段很容易完成,但是大部分流动青年都长期停留在城乡往返、变换城市、变换职业的第二阶段中,很多人未能进入第三阶段,即使进入城市停留定居阶段,也很难做到完全的城市融入。城市社会融入对融入者非常重要,借鉴移民的社会融入研究,社会融入包括文化、婚姻、观念、行为、公共事务等多方面的综合测量(Gordon, 1964)。完全的城市融入意味着融入者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身份等各方面与原住民无差异,实现“界限的跨越、界限的模糊和界限的重构”。判断城市完全融入的一个关键就是身份认同(李培林、田丰, 2012)。对流动青年来说,融入城市必须尽早地在主观上实现其对城市身份的认同。

城市居留意愿是城市融入的一个重要前提。积极的城市居留意愿,是流动青年加快融入城市的催化剂。“90后”流动青年普遍不具备完全融入城市的经济社会条件,研究其城市居留意愿显得更加现实。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15年国家卫计委最新一次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细致分析“90后”流动青年的群体特征和城市居留意愿,选取有代表性的经济社会指标对其城市居留意愿进行实证研究,获得一些有启发性的结论。

### 三、研究数据、模型和群体特征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库。国家卫计委的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技术文件显示,该数据是先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随机抽取样本点,然后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调查。调查对象是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流入人口。调查内容包括家庭成员、就业、收支、基本公共卫生等情况,2015年的调查共回收问卷20.6万份。本文通过对出生在1990-1999年的“90后”流动人口进行提取,获得研究样本38462个。分析发现,以婚姻嫁娶、拆迁搬家、投亲靠友、学习培训、参军为流动理由的人数较少,仅占样本的5.3%。按研究目的,对“90后”流动人口样本进行删减,同时剔除遗漏重要信息和有问题的个体样本,<sup>①</sup>最终获得的研究样本个数是36436。进一步根据研究样本中的个体是否工作,将总样本划分为就业和非就业两个细分群体子样本,样本数分别为29025和7411,占比80.7%和19.3%。

#### (二) 实证模型

本文选定序次逻辑回归(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作为实证研究模型,研究各影响因素对“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的作用效果。序次逻辑回归模型能够较好地处理因变量是有序分类的情况。根据问卷中对“您今后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问题的调查结果,将三个选项“打算、没想好、不打算”分别设置为1、2、3,数值大小反应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的由强到弱。将三种选择的概率分别定义为 $\pi_1$ 、 $\pi_2$ 和 $\pi_3$ ,构建的累积逻辑回归模型如下:

$$\text{logit} \frac{\pi_1}{1 - \pi_1} = -\alpha_1 + \beta_1 x_1 + \dots + \beta_p x_p \quad (1)$$

$$\text{logit} \frac{\pi_1 + \pi_2}{1 - (\pi_1 + \pi_2)} = -\alpha_2 + \beta_1 x_1 + \dots + \beta_p x_p \quad (2)$$

其中, $\pi_1$ 、 $\pi_1 + \pi_2$ 分别对应选择打算居留、没想好的累积概率水平,不打算居留的概率水平 $\pi_3 = 1 - \pi_1 - \pi_2$ ;  $\beta_1 \dots \beta_p$ 是各影响因素的估计系数,暂先假定不变;常数项 $-\alpha_1 < -\alpha_2$ ,表示分类序次因变量的取值差异;对估计系数取指数 $\exp(\beta)$ ,获得解释变量对城市居留意愿序次变化的优势比(张文彤, 2007)。关于自变量的设置和解释详见表1。

<sup>①</sup> 删掉户籍地是香港地区的1人、台湾地区的2人,不考虑跨境流动的1人。

表1 自变量及解释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个体特征	性别	虚拟变量: 男性 = 0; 女性 = 1
	民族	虚拟变量: 汉族 = 0; 少数民族 = 1
	婚姻	虚拟变量: 不在婚 = 0(含未婚、离婚、丧偶); 在婚(含再婚) = 1
	户口性质	虚拟变量: 农业 = 0; 非农业 = 1(含居民户口)
	流动范围	分类变量: 跨省迁移; 省内跨市迁移; 市内跨县迁移
	教育程度	分类变量: 未上过学及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
经济因素	工资收入	连续变量: 上个月或上次就业的月收入(取自然对数)
	收支比	连续变量: 家庭本地平均月收入除以月支出
社会因素	社会保险	分类变量: 合作医疗保险(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含公费医疗); 无医疗保险
	职业身份	分类变量: 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农业及产业工人; 无固定职业及其他
	就业身份	分类变量: 雇员(含其他); 雇主; 自营劳动者
区域变量	经济带	分类变量: 珠三角; 长三角; 环渤海; 其他地区

### (三) 群体特征

在互联网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加速变迁。深刻的社会结构变化不仅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发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在现代化道路上快步前行的自然结局。以社会结构分化整合为动力的中国社会转型,通过家庭、学校、同龄人以及大众化数字传媒等渠道,对“90后”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不同于其他代际人群的成长环境,导致“90后”流动青年形成了独特的群体特征。同时,随着“90后”个体成长的家庭、社区等微观环境的变化,他们在文化素质、社会心态、个人诉求、偏好等方面形成显著的差异,“小清新”、“杀马特”、“丁克”、“尼特”、“啃老”等专指性概念成为一部分“90后”的形象标签。

在这里,基于社会学研究强调的共变和异变思想,利用频率统计、分类平均值等统计指标,对“90后”流动青年的群体特征进行识别,并分析其城市居留意愿。

表2 “90后”流动人口的群体特征与城市居留意愿表现

类别变量	分类指标	就业群体 N = 29025		非就业群体 N = 7411		总样本 N = 36436	
		占比	城市居留意愿均值	占比	城市居留意愿均值	占比	城市居留意愿均值
性别	男	46.4%	1.789	24.3%	1.721	42.7%	1.781
	女	53.6%	1.756	75.7%	1.644	57.3%	1.726
民族	汉族	91.7%	1.775	86.7%	1.662	90.9%	1.753
	少数民族	8.3%	1.730	13.3%	1.665	9.1%	1.711
婚姻	不在婚	71.7%	1.827	48.9%	1.681	69.2%	1.805
	在婚	28.3%	1.631	51.1%	1.645	30.8%	1.636
户口性质	农业	88.3%	1.784	89.6%	1.668	89.1%	1.760
	非农	11.7%	1.672	10.4%	1.617	10.9%	1.662
流动范围	跨省	51.2%	1.836	47.1%	1.734	52.3%	1.817
	跨市	30.4%	1.714	31.9%	1.612	29.7%	1.692
	跨县	18.4%	1.685	21.1%	1.579	18.0%	1.661

续表 2

类别变量	分类指标	就业群体 N = 29025		非就业群体 N = 7411		总样本 N = 36436	
		占比	城市居留意愿均值	占比	城市居留意愿均值	占比	城市居留意愿均值
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及小学	4.0%	1.825	6.6%	1.726	4.6%	1.796
	初中	48.2%	1.826	49.6%	1.707	49.9%	1.801
	高中/中专	31.9%	1.754	31.4%	1.622	31.4%	1.727
	大专及以上学历	16.0%	1.628	12.4%	1.552	14.1%	1.616
经济带	珠三角	10.4%	1.980	7.3%	1.764	10.9%	1.948
	长三角	20.3%	1.792	14.9%	1.700	19.5%	1.778
	环渤海	14.8%	1.756	11.0%	1.556	13.8%	1.724
	其他地区	54.4%	1.727	66.8%	1.661	55.7%	1.712

考虑到就业与非就业群体很可能存在着较强的差异,且我们更加关心两个不同细分群体的特征表现。我们分别考虑了总样本、就业群体样本、非就业群体样本的情况(见表2)。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我们发现“90后”流动人口的群体特征与城市居留意愿表现如下:

女性流动人口数量明显大于男性,高出约15个百分点,非就业群体中的女性比例更高,达到75.7%。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占比依然较少,不就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比例高于就业的情况。流动人口中在婚的比例不高,约为三成,非就业群体中在婚比例高于不在婚情况,叠加考虑可以发现,在婚女性仍然是非就业群体的主要构成。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占比接近九成,如果以户口性质简单地将其定义为农民工的话,在我国“90后”流动人口中,农民工仍旧是主力,或许可以将其定义为第三代农民工。“90后”流动人口偏好于远距离流动,跨省流动比例远大于跨市和跨县流动比例,我国流动人口远距离流动的特点在“90后”身上得到了延续。“90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较好,未上过学及小学比例不足5%,近一半完成了9年义务教育,高中/中专文化的流动人口比例也超过了三成,大专及以上学历在流动青年中也不再稀缺,7个人中就会有1个拥有高学历,接受过高等教育。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与其他地区相比,仍然是“90后”流动人口偏爱聚集的区域,长三角的吸引力明显大于环渤海和珠三角地区。非就业群体与就业群体的大部分群体特征相似,在向三大经济发达区域集聚方面,非就业群体弱于就业群体,此外,非就业群体的远距离流动比例和高学历比例要略低于就业群体。

在婚、非农户口、近距离流动、高学历对城市居留意愿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婚姻能够显著提高“90后”流动青年的城市居留意愿,尽管其在总样本和就业群体中仅为30.8%和28.3%,但其与非在婚群体相比,在长期居留城市意愿方面分别提升了9.3%和10.7%。拥有非农户口的流动青年具有更强烈的城市居留意愿,均值低于1.7。最近距离的跨县流动人口具有更积极的城市居留意愿,就业和非就业群体中的跨县流动比例分别为18.4%和21.1%,均值水平较跨市和跨省流动低,分别为1.685和1.579。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流动青年的城市居留意愿明显增强,就业和非就业群体中的“大专及以上学历”高学历个体,城市居留意愿均值为1.628和1.552,与最低学历相比,偏向于长期居留城市的意愿提升了10%以上,并且高学历流动青年是在所有类别变量划分得到的子群中,城市居留意愿最强烈的群体。

我国的三大经济发达地带对“90后”流动青年的城市居留意愿有显著差异性影响。对于就业群体而言,按城市居留意愿强弱排序为其他地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尽管前三者的均值差距不大,但其流向珠三角的城市居留意愿较弱,值得深思。对于非就业群体,城市居留意愿的强弱次序略有改变,依次为环渤海、其他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珠三角仍然是居留意愿最弱的地区。此外,在各类别变量划分的子群中比较,发现珠三角的城市居留意愿都是最弱的,对“90后”流动青年来

说,珠三角或许不再像过去三十多年那样,存在着明显优势的强吸引力。

全面横向对比所有分类下的就业和非就业群体城市居留意愿,发现除婚姻分类外,<sup>①</sup>其他各种分类均表现出非就业群体拥有更强的城市居留意愿。这表明“90后”流动青年通过就业可以获得经济收入能力,但不能在城市居留意愿方面获得对非就业群体的比较优势,恰恰相反,后者反而更加倾向于在城市长期居留。

## 四、“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分析

### (一)“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影响因素

除婚姻、户口、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因素对“90后”流动青年的城市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外,经济和社会两大因素对人口的流动迁移具有重要影响。推拉理论、城乡二元结构理论、新人口迁移经济学等都高度重视经济因素的影响。经济是贯穿农村流动人口进城、频繁返城、更换城市、最终留城的核心问题。对此,本文选择流动青年的平均月工资为重点考察指标,同时考虑城市生活成本支出的影响,以及流动人口支出异质性问题,计算家庭本地平均月收入除以月支出的倍数变量,以此作为流动人口城市生活保障能力的反映;该指标具有测度经济融入的功能。

社会因素对人口流动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青年成长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化过程,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共同对青年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社会资本的形成与个体的社会网络、以及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密切相关。社会地位、工作性质、职业身份、就业身份是一组相互耦合的变量,构成社会资本形成与累积的重要基础。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不仅在流动动机上具有显著影响,还积极作用于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效果。是否与本地居民形成良好互动的社会交往网络,是否在本地的熟人社会中获得身份认同,自己是否形成对本地身份的主观认同,都需要流动青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来完成。这里,本文选择“90后”流动青年的职业身份和就业身份两个变量做解释变量,二者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积累非常重要。针对职业身份分类过细的问题,本文进行了新的分类调整。将“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统一定义为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将“经商”、“商贩”、“餐饮”、“家政”、“保洁”、“保安”、“装修”、“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统一定义为“商业服务业人员”。<sup>②</sup>将“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建筑”、“其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统一定义为“农业及产业工人”。<sup>③</sup>将“无固定职业”、“其他”划为一类。<sup>④</sup>其他的调整分类还包括:将不选择“雇员、雇主、自营劳动者”三种身份的其他人员归为雇员一类,依据是其对职业情况的详细描述倾向于证明他与非固定的雇员相似。

医疗保险是涉及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的问题。流动青年的医疗保险状况,显然是影响其居留城市意愿的重要社会因素。流入地政府针对流动青年的医疗保障努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对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态度。根据当前5种常见医疗保险的性质、条件、统筹缴纳方式和政府投入情况,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统一定义为“合作医疗保险”,将少数人享受的“公费医疗”归并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中,并将未明确回答或否定回答参与上述医疗保险的人划为“无医疗保险”一类。

① 在婚的非就业流动青年的城市居留意愿略弱于就业流动青年。

② 这里没有将“经商”区别出来是因为人数相对较少,且根据受访者对职业情况的详细描述,大多选择经商的并非收入高、经营规模大的企业老板,很多非固定工作的工友、技工、淘宝店主也选择“经商”一栏,如此还可避免与就业身份中“雇主”子类的重合;为规避性别影响,同样没有区分“家政”、“保洁”、“保安”、“装修”等性别偏向性强的职业分类。

③ 城市经济活动的特点导致城市中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流动人口很少,实际获得的样本也是如此,因此没必要单独划分出农业生产人员。

④ 这里没有考虑非就业的问题,对于非就业群体,本文进行单独的量化分析。

## (二) 实证结果与分析

综合考虑人口学、经济社会变量对“90 后”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分别构建就业和非就业群体为对象的序次逻辑回归实证模型,<sup>①</sup>使用 SPSS22 进行估计。

表 3 “90 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的实证结果

类别	分类指标	就业群体			非就业群体		
		回归系数	P 值 Sig.	OR 值	回归系数	P 值 Sig.	OR 值
	截距 1	.645	.002		.870	.000	
	截距 2	2.615	.000		2.718	.000	
	工资收入	.054	.000	1.055			
	收入支出比	-.082	.000	.921			
性别(女性)	男性	-.004	.854	.996	.145	.011	1.156
民族(少数民族)	汉族	.194	.000	1.214	.035	.619	1.036
户口(非农)	农业户口	.081	.029	1.085	.014	.859	1.014
婚姻(在婚)	不在婚	.492	.000	1.636	.176	.001	1.192
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	未上过学及小学	.445	.000	1.561	.474	.000	1.606
	初中	.364	.000	1.440	.412	.000	1.510
	高中/中专	.231	.000	1.260	.179	.020	1.196
流动范围(跨县)	跨省	.340	.000	1.405	.470	.000	1.600
	跨市	.085	.011	1.089	.091	.153	1.095
职业身份(无固定职业及其他)	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	-.179	.022	.836			
	商业服务业人员	-.029	.677	.971			
	农业及产业工人	.219	.002	1.245			
就业身份(自营劳动者)	雇员	.405	.000	1.499			
	雇主	-.217	.002	.805			
医疗保险(无)	合作医疗保险	.230	.000	1.259	.300	.000	1.350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144	.002	.866	.217	.168	1.242
经济带(其他)	珠三角	.422	.000	1.525	.201	.025	1.223
	长三角	-.091	.006	.913	-.075	.279	.928
	环渤海	-.035	.297	.965	-.361	.000	.697

由表 3 可知,经济因素对“90 后”就业群体的城市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工资收入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 $\beta = 0.054$ ,  $p < 0.01$ )。这表明收入的增加不利于“90 后”流动青年融入城市意愿的提高;尽管影响幅度较小( $OR = 1.055$ ),<sup>②</sup>但这与传统人口迁移理论提出的经济改善迁移动机相悖。或许对“90 后”来说,工资收入并不是长期居留城市、融入城市的重要决定因素。结合样本内的实际,较高的工资收入通常与辛苦的生产、建筑等工作相关联,这类工作收入的增加通常是劳动时间延长的结果,因此,增加工资收入未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工资纯收入不能代表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质量,更具测度功能的收入支出比系数估计结果显著为负( $\beta = -0.082$ ,  $p < 0.01$ ),与预期相

① 非就业群体的估计方程中没有有关收入和工作的解释变量。

② 序次逻辑回归模型的估计获得 OR 值表示反应变量上升一个等级的概率比。对于城市居留意愿有强到弱的次序,其数值反应的是选择不愿意长期城市居留的发生比情况,考察其倒数可以判断愿意长期居留城市的发生比情况。

一致,即收入支出比的变大可以显著增强“90后”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 $OR = 0.921$ ),收入支出比的一单位变化可以使选择愿意长期居留的发生比提高8.59%。

社会因素对“90后”就业的流动青年的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以“无固定职业及其他”群体为参照,具有相对较高社会地位的“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城市居留意愿显著( $p = 0.022$ ,  $OR = 0.836$ ),其选择愿意长期居留的发生比提高19.65%,这与该类人员具有较好的社会资本条件,具有融入城市社会优势相关。“商业服务业人员”与参照组无显著差别,属于同一个层次。“农业及产业工人”的城市居留意愿显著低于参照组( $p = 0.002$ ,  $OR = 1.245$ ),这与工业生产、建筑等工作条件较差,劳动时间长相关。对比“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和“农业及产业工人”,后者选择长期居留意愿发生比仅是前者的67.11%,这表明“90后”流动人口的职业分类导致的城市居留意愿差距较大,有必要关注当前我国在城市从事产业工人工作的流动人口的生活状态,及其是否城市居留的决定。以自营劳动者为参照,雇主的就业身份表现出的积极城市居留意愿显著( $p = 0.002$ ,  $OR = 0.805$ ),雇员的消极城市居留意愿显著( $p < 0.01$ ,  $OR = 1.499$ ),雇主相对于雇员在愿意居留城市上发生比的优势达到1.86倍,这与雇主拥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较强的社会资本相吻合,但这部分人群占比较少,仅占样本总量的3.5%。

是否享受医疗保险对“90后”流动青年的城市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拥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就业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更加积极( $p = 0.002$ ,  $OR = 0.866$ ),选择长期居留的发生比提高15.5%。拥有“合作医疗保险”的“90后”流动青年,占样本达到79.8%的高比例,但其城市居留意愿偏低,选择居留的发生比仅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人群的68.8%,甚至低于无保险群体,家乡农村合作医疗的存在似乎对流动青年返乡形成吸引力。对非就业群体而言,无医疗保险的“90后”流动青年,具有最强的城市居留意愿。借用“尼特”现象的解释,自我选择非就业的“90后”根本不在乎就业和保险等事项,他们是属于城市的,而非乡村和家乡小城镇。

性别、民族、户口、婚姻、教育程度、流动范围、流入区域对“90后”流动青年的城市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性别方面,就业流动青年的居留意愿无显著的性别差异( $p = 0.854$ ),非就业男性青年的居留意愿明显弱于女性( $p = 0.011$ ,  $OR = 1.156$ )。民族方面,就业群体的汉族青年居留意愿显著弱于少数民族( $p < 0.01$ ,  $OR = 1.214$ )。户口方面,就业群体的农业户口青年在居留意愿上显著占优( $p = 0.029$ ,  $OR = 1.085$ )。非就业青年的民族和户口差别对其城市居留意愿影响不显著。婚姻方面,不在婚青年显著弱于在婚青年。受教育程度方面,按未上过学及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水平上升,流动青年的城市居留意愿显著增强,正向影响显著。“大专及以上”的流动青年愿意长期居留的发生比是“未上过学及小学”的1.56倍。流动范围方面,跨省与跨市流动青年的愿意长期居留的发生比都显著差于跨县流动,就业与非就业群体的流动青年情况一致。流入区域方面,长三角对就业青年的长期居留意愿有显著正影响( $p = 0.006$ ,  $OR = 0.913$ ),珠三角就业青年愿意长期居留城市的发生比最弱,相比其他地区仅为65.6%,相比长三角仅为59.9%,环渤海地区与其他地区没有显著差异;非就业青年结果略有不同,珠三角仍是青年愿意长期居留城市的发生比最弱的地区,环渤海地区对青年长期居留意愿产生显著正影响( $p < 0.01$ ,  $OR = 0.697$ ),长三角与其他地区无显著差异。

##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90后”作为互联网大发展背景下成长的一代,具有与其他年龄段显著不同的代际群体特征。本文利用全国36436份“90后”流动人口调查问卷数据,细致分析“90后”流动青年的群体特征和城市居留意愿表现,在控制婚姻、户口、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后,选择工作收入、职业性质等经济社会因素指标,构建就业和非就业群体的城市居留意愿影响因素实证模型,经过定性定量分析,本文获得如下主要结论:

一是“90后”流动青年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青年流动人口的结婚比例低,女性人口占比高。



存在着“尼特”现象,表现为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但数量不多,非就业群体主要由在婚女青年构成。农业户口流动人口近九成,“90后”流动青年中的“杀马特”个体应远大于“小清新”个体。跨省远距离流动者超过一半,受教育程度整体提升,大专及以上学历比例为16%,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发达地带是流动青年集聚的重要地区。

二是“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表现出明显的内部分化特征。根据居留意愿平均值比较,发现在婚流动青年、非农户口流动青年、近距离流动青年、高学历流动青年的城市居留意愿更强烈。三大经济发达地带中珠三角流动青年的城市居留意愿较弱,环渤海地区非就业流动青年的城市居留意愿更强。无论哪种分类,非就业流动青年都比就业流动青年的城市居留意愿更强。更细的群体划分显示,没工作的高学历“90后”流动青年,具有最强的城市居留意愿。

三是性别、民族、户口、婚姻、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对“90后”流动青年的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各变量的影响表现与“90后”流动青年的分化特征相一致。流动范围、流入区域对“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也有显著影响。近距离跨县流动的就业与非就业群体,在选择长期居留的发生比上占据明显优势,流入珠三角的就业群体选择长期居留城市的发生比仅为长三角的59.9%,对于流入环渤海地区非就业群体来说,选择长期居留城市的发生比值更大。

四是经济社会因素对“90后”流动青年的城市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提高“90后”流动青年的收入支出比,可以显著提高“90后”流动青年选择长期居留城市的发生比。而“90后”流动青年的高工资收入,没有表现出与长期居留城市意愿直接的正相关关系,样本估计结果显示,收入的增加会损害“90后”流动青年的城市居留意愿。与社会资本形成累积密切相关的职业身份和就业身份,对“90后”流动青年的城市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较高社会地位的“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的城市居留意愿,显著优于其他职业,农业及产业工人选择愿意长期居留的发生比,仅是前者的67.11%。占样本3.5%的雇主,居留城市意愿显著优于雇员和自营劳动者。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可以显著提高“90后”流动青年的城市居留意愿。

根据上述结论,从积极提高“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融入城市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全面提高青年人口的教育程度。尽可能早地拉近青年群体与城市的距离,为未来成为流动人口的青年建立融入城市的良好基础条件。通过文化程度的提高,共同的城市生活经历,加强“90后”流动青年的社会认同。重视互联网对流动青年个体性格、思维、习惯的影响,加强“小清新”、“杀马特”等特殊行为文化个体与主流群体的融合,在“90后”流动青年的价值取向上,普遍形成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克服“尼特”现象的扩大与不利影响。重视大学教育的作用,支持“90后”流动青年接受高等教育,这是因为在城市接受教育的过程,使得“90后”流动青年拥有一段不考虑工作挣钱的无压力城市生活经历,这有利于青年群体心理上更好地接受城市、认可城市,养成城市生活的习惯。发挥大学同学的人际交往作用,促进各类“二代”人群的交往。

二是鼓励青年流动人口以家乡为原点进行近距离流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除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外,不同区域也普遍形成了单中心的城市体系,如在一省内普遍形成以省会为中心的经济格局。鼓励、支持“90后”流动青年就近就业生活,有利于“90后”流动青年有效地利用继承家庭血缘累积的社会资本,加快青年个体自有社会资本的形成积累,降低在中国“熟人式”社会关系网络中生存的各种交易成本,提高“90后”流动青年的长期城市居留意愿。针对目前中国青年普遍的晚婚现象以及择偶难的大规模单身青年问题,近距离流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90后”流动青年在较丰裕社会资本的帮助下,尽早地实现婚姻幸福,从而间接地提高流动青年的长期居留城市意愿比例。

三是加快完善城市的公共服务配套改革。各大中小城市政府部门,要密切关注“90后”青年流动人口的生产生活,提供针对性更强、效果更好的社会公共服务,来赢得“90后”青年流动人口的偏爱,吸引他们长期居留城市、融入城市。具体的,在经济方面,积极提高“90后”青年流动人口的收入支出比,在降低流动青年的必要成本支出上做文章,如廉租房、保障房建设配给,提供快捷便利廉价的公共交通服务,配套提供低收费的幼儿儿童教育服务等。积极支持流动人口创新创业,出台扶

持“双创”政策,鼓励更多流动人口成为自营劳动者、雇主老板。从更长远的角度,积极推动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扩大第三产业发展比例和质量,提供更多的地位较高的工作岗位。在保障方面,积极做好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服务工作,推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普及,或者提供更高水平的城乡合作医疗保险,保障流动人口在享受医疗保险服务上均等化。在社会方面,为“90后”青年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社交机会,为其社会资本积累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90后”青年流动人口快速进入城市居留阶段,在主观上形成对自身身份的城市认同,完全融入到城市中。

#### 参考文献:

- 蔡昉 2001,《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崔岩 2012,《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 方黎明、谢远涛 2013,《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村已婚男女非农就业》,《财经研究》第8期。
- 李培林 1996,《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李培林、田丰 2012,《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社会》第5期。
- 李强 2003,《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刘传江、程建林 2008,《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人口研究》第5期。
- 邵岑、张翼 2012,《“八零前”与“八零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行为比较研究》,《青年研究》第4期。
- 施芸卿、罗滢 2014,《“90后”大学生的数字化生存》,《青年研究》第6期。
- 田丰 2009,《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70后”和“80后”青年的公平感和民主意识研究》,《青年研究》第6期。
- 王春光 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王凯、周密 2015,《日本首都圈协同发展及对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启示》,《现代日本经济》第1期。
- 张文彤编 2007,《SPSS 统计分析高级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周怡 1994,《代沟现象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朱宇、林李月 2011,《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从“城市融入”到“社会融入”》,《地理科学》第3期。
- Fan, C. C. 2005,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990 and 2000 Census Comparisons.” *Archives of Disease in Childhood* 57.
- Gordon,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G. 2003, “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in the 1990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4.
- Knight, J., Deng Q. & S. Li 2011, “The Puzzle of Migrant Labour Shortage and Rural Labour Surplu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2.
- Lee, E. S. 1966,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3.
- Lewis,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5.
- Ritchey, N. 1976, “Explanations of Migr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
- Stark, O. 1991, “Migration in Less Development Countries: Risk, Remittances and Family.”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4.
- Stark, O. & J. Taylor 1991, “Migration Incentives, 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9.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责任编辑: 张芝梅

### **The Evolution of Given Names and Times Change**

..... *Su Hong , Ren Xiaopeng , Lu Kewen & Zhang Hui( 31)*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centages of popular given names in 3173 samples from ten cities and 97543369 samples from the whole country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given nam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imes change. Based on the related studies , we explore the tendency of times change in Chinese self-independence from 1950s to 1990s using ten years as the distinguishing criter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amples from ten cities and the total analysis of whole country , the percentages of Chinese popular given names were declining gradually from 1950s to 1990s. Hence we could conclude that Chinese self-independence were strengthening gradually from 1950s to 1990s.

**Keywords:** Given Names Independence Times Change Values

### **The Study on Urban Residence Willingness of Post –90s Floating Youth**

..... *Yang Dongliang & Wang Xiaolu( 39)*

**Abstract:** With their unique intergeneration characteristics , the post –90s floating youth have attracted research passion from many scholars. Using survey data from “The Dynamic Monitoring of 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5” ,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group features of post –90s floating youth and the influences of each factor on urban residence willingness of post –90s floating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ing gender , ethnicity , household registration , marital status , education level , mobile scope and inflowing area all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tial influences on urban residence willingness of post –90s floating youth. For post –90s floating youth , if they have higher capability in urban life security and employment status with higher social capital , their long-term urban residence willingness could be enhanced significantly. On the basis of these analyses ,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urban integration of post –90s floating youth , we put forward several inspiring policy suggestions , that is comprehensively enhancing young population’s educational level , encouraging young population to conduct near-distance mobility around hometown , and rapidly completing the necessary reform of urban public services , etc.

**Keywords:** Post –90s Floating Population Urban Integration Residence Willingness

### **The Bludg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jects to Villages” .....** *Li Zupei( 49)*

**Abstract:** Regarding the bludg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jects to villages” , it could provide the suitable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rural socie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ry of resources into countryside.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projects to villages” in three villages , this paper tries to present different types of the bludg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jects to villages” and their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 then tries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cau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he study shows that operating villages , operating projects and the “grey agents” are three main types of participation for these bludgers to interven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re related projects; and they could lead to some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 including the solidification of village power structure , the block of resource input channels , and the shrinkage of rural governance space. The bludg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jects into villages” and their power are conspicuous , and this has revealed the adjustment and disordering of connecting bond between state and rural societ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 how to straighte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tate , the rural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and the village society , and how to realize the institutionalized permeability of the state into rural society will become the acting point in the study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Keywords:** Bludgers Projects to Villag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Education Servic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 *Tang Lina & Wang Jiwen( 58)*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of 2013 –2014 school year from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rea and rural area , local residents and migrants and the